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 CCER校友通讯

CCER Alumni

2012.12 总第1期



# 目录

卷首语.....	1
院长贺信.....	2
往事掠影.....	3
朗润新闻.....	6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宣布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命 .....	6
曾毅教授获美国公共卫生学刊2011最优论文奖 .....	7
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行“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 .....	8
2012北京论坛：林毅夫教授谈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 .....	9
亚行与国发院发布合作报告	
“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10
校友黄志刚博士荣获201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	11
朗润研究.....	12
朗润观点.....	17
姚洋：中国新领导层第一道关 .....	17
卢锋：透视日本“低增长稳态” .....	18
周其仁：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 .....	20

## 卷首语

2012年10月，在现任院长姚洋老师、研究生办公室行桂英老师、研究生会户德月主席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生会校友部正式成立。校友部旨在为研究生校友和学院之间建立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加强CCER研究生校友的凝聚力。

CCER自1996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起，至今已经培养了600多名研究生。CCER研究生校友活跃在政界、商界和学界等各个领域，很多都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行家、精英。很多校友在关注学院发展，其实CCER也在关注着遍布世界各地的校友们的发展。CCER研究生校友部的成立，必将推动CCER在校师生和历届校友之间更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CCER校友通讯》是一本为CCER研究生校友免费发送的电子刊物（暂时只有电子版），每年发行六期，常规内容包括：朗润新闻、朗润研究、朗润观点。除此之外，我们还计划在以后的期刊中加入优秀校友风采、在校生风采板块。本期为我们发布的第一期校友通讯，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请各位校友多提意见。希望《CCER校友通讯》能够成为除学院官方网站以外，历届校友了解学院、学校最新动态的重要途径和工具。

校友部计划于明年春季在北京召开CCER校友联谊会，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CCER研究生校友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进一步帮助校友们在各地建立校友分会，加强CCER校友们的凝聚力。

目前校友部正在统计并更新已毕业校友们的联系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欢迎拥有同级同学最新通讯录的校友与我们取得联系，帮助校友工作的开展。

校友部今年刚刚成立，工作中还存在很多考虑不周之处，忘各位校友多多原谅。欢迎广大校友多提建议，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会逐步加以改进。

附：

校友部邮箱：[ccerxiaoyou@ccer.edu.cn](mailto:ccerxiaoyou@ccer.edu.cn)

校友部官方新浪微博：CCER研究生校友会 <http://weibo.com/u/3135854685>

本届校友部人员组成：

部长：梁中华（2011级直博） [liangzhonghua2008@gmail.com](mailto:liangzhonghua2008@gmail.com)

副部长：李志昂（2011级硕士） [zhianglee@gmail.com](mailto:zhianglee@gmail.com)

副部长：杨越（2011级直博） [oliviayangyuepku@gmail.com](mailto:oliviayangyuepku@gmail.com)

部员：王凯（2012级硕士） [wkseraph18@gmail.com](mailto:wkseraph18@gmail.com)

部员：谭语嫣（2012级硕士） [yuyan.tan11@gmail.com](mailto:yuyan.tan11@gmail.com)

欢迎与我们联系。

## 院长贺信

欣闻国发院研究生会创办《校友通讯》，我感到非常高兴。自国发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6年招收第一批学生以来，国发院已经培养了600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自开办之日起，国发院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就保持了全国领先水平。我们开风气之先，率先引入全套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在博士项目中，我们首先实行了资格考试制度。国发院的研究生课程设计和培养计划成为引领全国的标杆。大家普遍反映，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近乎魔鬼训练；当别的系的同学聚会狂欢的时候，国发院的同学却要伏案奋读。但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洗礼，国发院的毕业生收获了严谨的分析能力，在深造和工作的过程中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近几年来，国发院进一步加强了博士项目的培养计划。改进之一是全面实行直博和硕博连读制度，由此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生。改进之二是为每个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提供九个月的出国进修机会，让他们接触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改进之三是设立了分学科的研讨班，为博士生提供一个更加专业化的研讨平台。我们正在酝酿研究生教学的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加强专业建设，强化研究生第二年的专业课设置。

十几年来，国发院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我们的众多硕士生毕业生得到在世界顶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其中一些毕业之后在世界名校找到教职工作。其他硕士毕业生则直接在国内就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本行业崭露头角。我们的许多博士毕业生获得国内高校的教职，其中一些还获得海归待遇；几位毕业生还在国际机构或国外大学找到工作。进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更是如鱼得水，一些人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毕业生是国发院最大的骄傲，也是国发院最大一笔财富。《校友通讯》的创办拉近了你们和国发院之间的距离，将会成为你们和国发院之间联系的一座桥梁。另外，我相信，她也将成为毕业生之间联系的纽带之一。

在此，借《校友通讯》发刊之际，我谨代表国发院全体教师和工作人员向各位校友表达由衷的问候，祝福你们在各自的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也希望你们多关注国发院的发展，常回朗朗园看看。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2年11月27日

### Part 1

你还遇到过我吗？在校园行走在青春里的我，想要偶遇走向成熟的你。

记不记得与亲切睿智的老师们初遇的夏令营，漫长沉静的考研备战时光？

记不记得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的我，最畅快淋漓的心情？



左一：运动会开幕式；左二：足球队合影；左三：中心首届夏令营

右一：在长城上摆出“CCER”的字样；右二：女子篮球队合影；右三：定向越野队合影

记不记得三高给你沉淀下的理论基础，永远都读不完的论文和思想？

记不记得欢乐的宿舍文化，中秋元旦晚会上的欢声笑语？



左上：02中秋晚会暨开学典礼；右上：03元旦晚会；左下：07中秋晚会；右下：06新年晚会

左上：04年舞会；右上：97年运动会；左下：旧照，欢庆；右下：教授们的盒饭时光



## Part 2

我想你偶尔会想起我。

面对人生抉择时迷茫的我，重要事情前焦虑的我，内心时常犹疑时常困惑的我，你现在释然了吗？

学术时认真专注的我，充满理想和热情的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时的我，缘分面前还青涩腼腆的我，我想你依然珍视着吧。



我就是你曾经的模样。而你，是我的未来。



##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宣布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命

11月26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朗润园万众楼召开全体大会，正式宣布以姚洋教授为院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任命。北大副校长刘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大党委组织部部长郭海，北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章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巫和懋、卢锋、胡大源、赵耀辉、张黎等教授、员工等出席了仪式。北大党委组织部部长郭海主持仪式。

会议开始，北大党委组织部部长郭海首先宣布了学校的任命通知：学校研究决定，任命姚洋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大源、赵耀辉、张黎为副院长。至此，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宣布任职。现场的教授及员工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新班子的支持。

接下来，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院长周其仁教授发言，他首先对新班子的成立表示了祝贺。他表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林毅夫教授的带领下，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初具规模。在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后的这几年，更加注重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纳入学院范畴。未来的十几年，既是黄金机遇，也是充满挑战的时期，相信在新班子的带领下，学院将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新任院长姚洋教授，在发言中感谢了学校党委对学院的大力支持，感谢前任班子所作出的大量工作和牺牲，感谢各位同事对新班子的支持。他表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家发展研究院已经在科研和人才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优势，未来的发展目标，锁定在世界一流的，以经济学科为基础的，跨学科的科研与教学机构，并同时成为世界一流的智库。他相信，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各位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院足以实现这两个目标，并为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做出贡献。

前常务副院长巫和懋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以来，秉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严谨治学的传统，并在经济学科的基础上，着力发展跨学科研究。相信在新一届班子的带领下，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会在这一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前任副院长卢锋教授，作为学院教授代表发言，他表示，朗润园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和而不同”，虽然大家经常在学术观点上并不一致，各有所持，但并不妨碍相互的合作与交流，并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相互推动。他相信，在新班子的带领下，朗润园依然会坚持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继续前行。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章政在发言中祝贺国家发展研究院新领导班子的任命，并从兄弟院系角度，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学院直接的合作与交流，为建设北大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科研教学而共同努力。

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发言中首先祝贺新领导班子的任命，并对学校向学院一贯的支持深表感谢。他在发言中表示，未来的3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很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要在中国崛起、中华文化复兴的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不仅有能力，也有责任打造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探讨平台。面对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不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理性、实事求是的观点。他对新的班子寄予厚望，并号召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会议最后，北大副校长刘伟代表学校，向新班子的任命表示祝贺，对国家发展研究院十几年来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对学校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对姚洋教授提出的建设目标十分赞同，并相信学校将会全力支持这一建设过程。他相信，在新班子的带领下，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会在未来的十年中，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 曾毅教授获美国公共卫生学刊2011最优论文奖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为第一署名的论文，在2012年10月30日在美国公共卫生学会年会上，荣获美国公共卫生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1最优论文奖。获奖的论文题目为：关于中国老人健康和死亡率与环境因素的相关关系（Yi Zeng, Danan Gu, Jama Pursner, Helen Hoeing, and Nicholas Christakis. “Associa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with Elderly Health and Mortality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0;100(2):298-305）

据了解，美国公共卫生学刊是美国公共卫生学会学术刊物，月刊，1911年创刊至今已出版发行101年，2011年影响因子为3.93，在全球131家有影响的公共卫生、环境和职业健康相关期刊中排列第三。在该刊2010年发表的约400篇论文中，经学术委员会参照论文发表2年后被引用等评审，五篇论文获“美国公共卫生学刊2011最优论文奖”，曾毅等人的论文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公共卫生学刊公布的五篇获奖论文名单中排列第一。

论文评语如下：

As a way to acknowledge contributions to the AJPH, the Editor-in-Chief developed a process whereby individuals could be recognized for their roles as authors or reviewers of recently published papers. Two categories of awards were established. The first is the AJPH Paper of the Year. This award recognizes a published paper that substantially contributes to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issue or has advanced a given public health policy or program. Criteria for selection include a paper that addresses an important and timely public health issue; is innovative, offering new knowledge or insights; has the potential to have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impact; and advances public health. The second category is the AJPH Reviewer of the Year which was established to recognize a reviewer who has done the most to strengthen a paper or papers prior to publication. Specifically, this award recognizes a reviewer who is willing to devote their time, care, and expertise and offers honest, thoughtful, and constructive feedback to authors that ultimately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a paper.

## 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行“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未来十年的中国”为主题于2012年11月21日特别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科部部长李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等参加研讨会，就热点话题发言并参加研讨。胡大源、杨壮、张帆、雷晓燕、沈艳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教授也都特别列席了会议。

全天的研讨会又细分为四个热点话题：“回顾与展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世界定位”。下午17点20分，虽然预定的研讨结束时间已过，但全场依然气氛热烈，座无虚席，意犹未尽。姚洋教授代表主办方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真诚、热情、深刻的讨论，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 2012北京论坛：林毅夫教授谈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

2012年11月2日下午，在2012北京论坛“反思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世界面临的挑战”分论坛中，林毅夫教授作为第一位发言人就“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危机”发表了看法。在分析了东亚经济体从2000到2008年于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变化，并结合当时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均增加贸易顺差的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指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而根本解决方法则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在保留每个国家的货币的同时建立系统的国家储备货币和全球储备货币——“纸黄金”，并且两者以固定汇率挂钩。



在论坛的讨论环节，众多学者对林毅夫教授发言中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纸黄金与金本位有何区别、纸黄金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究竟该以怎样的国际主权机构来发行与流通纸黄金等问题，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

针对这些疑问，林毅夫教授对“纸黄金”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与解释。“纸黄金”是凯恩斯提出的“班克尔”的改进版，而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

发行“纸黄金”，取决于什么时候超国家储备货币对所有国家都产生双赢效率。十年或二十年后，可能有些国家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如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日元等。但这一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存在不稳定风险，可能会产生大量国际炒家和投机行为，这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都不利。与之相对的则是通过“纸黄金”这样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可以避免用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

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显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目前人民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原因是中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实力并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同时，这也会给投机行为创造条件。

在讨论结束之后，记者和林毅夫教授也进行了简单交流。林毅夫教授推荐了他的两本新书《从西潮到东方》和《解读中国经济》。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国际机构和措施来保障“纸黄金”的发行与流通、纸黄金有何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与概念，在书中均有详细阐述。

# 超越低成本优势： 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Growing beyond the Low Cost Advantage: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Avoi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 亚行与国发院发布合作报告

### “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10月2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第31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发布双方合作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报告。

本报告探讨中国应如何应对面临的问题、保证经济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达到在2030年前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首先，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5000美元，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次，中国三十几年的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低成本优势，而未来几年因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增长将越来越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推动。再次，由于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问题，如增长来源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与供给的制约、环境的恶化等，同时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些问题如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三方面的对策。一是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深化改革，包括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的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如果这些对策能够加以有效实施，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 校友黄志刚博士荣获201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生黄志刚博士的学位论文《资本流动视角下外部不平衡的原因和治理研究》荣获201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我院培养的首位博士荣获这一学术殊荣。

黄志刚博士2010年从我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易纲教授；同年进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工作，现为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并担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职务。目前，黄志刚博士已经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国内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十篇。

黄志刚博士的学位论文《资本流动视角下外部不平衡的原因和治理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论文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会出现外部不平衡？（2）如何解决外部不平衡？以及（3）未来如何预防外部不平衡的产生？论文分析资本流动对贸易和汇率的影响，从资本流动视角为外部不平衡提供了解释；分析资本流动如何影响不同政策对于调整外部不平衡的效果；以及资本流动下预防外部不平衡的政策选择问题。论文的研究主要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NOEM）”理论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方法，并对该理论进行了多种拓展和改进，使得新框架更加符合中国现实，能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

论文认为，中国大量吸引外资流入是外部失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资部门。外资部门获得的利润以换取中国产品的方式流出国界，从而导致中国出现经常账户盈余。文章指出，外资流入对中国福利的提高是有条件的。如果外资以低技术、高垄断和挤压中国国内产业方式进入，对中国居民有损。

文章分析了货币和汇率政策对于缓解中国经常账户不平衡的作用。通过建立一个小国开放宏观模型对中国的名义政策的分析发现，采用人民币升值的政策要明显优于通过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政策。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1）汇率调整能够较快实现经常账户平衡，（2）汇率调整不会引起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过度波动，（3）汇率调整更有利于福利改善。文章还发现，通过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经常账户不平衡的调整。论文还对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改善中国经常账户不平衡进行了理论研究，并提出人民币升值能否降低贸易顺差依赖于汇率传递程度的新观点。

文章还分析了在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协调内外均衡。论文突破了传统的资本流动假设，将不完全资本流动特点和资本流动影响生产的特征刻画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涌入（或流出），会快速扩张（或收缩）国内供给，最终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论文还得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结论：一定程度的汇率干预能够有效的降低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从而降低经济波动，这为汇率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 简报与讨论稿（2012.7至今）

### 林毅夫教授：



1、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中国在2030年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高收入国家正经历着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低投资回报率 的艰难时期。中国自身也面临三重失衡的挑战，即外部经济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

未来二十年中国对多极增长世界将会有五大贡献：第一，中国会为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扩张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第二，中国的快速增长也会充分支持商品价格；第三，中国政府的海外投资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为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第四，中国会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龙头，随着中国升级到更复杂的商品市场，中国会为低收入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五，中国也会促进新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形成，中国在G20框架下的话语权会更大，人民币也许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总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通过进出口、对外投资、产业转移等方面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它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机制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性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

新的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变迁。林毅夫教授说，之所以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其主要新在以下几个地方：第一，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配置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

级。第二，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取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反应了处于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

林毅夫教授也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金融结构的优化、人力资本投资、国际资本的流动、流动性陷阱。

### 陈平教授：



2012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平教授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的观察和经济学的反思”的演讲。陈平老师分析了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传统理论解释金融危机的缺陷，并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建议。

演讲中，陈平老师分享他最近的研究成果。与传统金融学中均衡下的代表者模型不同，陈平老师发展了非均衡多体相互作用的复杂金融学。用一个分布函数随时间变化的生灭过程作为主方程来进行分析，发现之前金融理论没有发现次贷危机是因为只计算均值和方差，忽略了高阶矩。根据主方程来计算，实际上危机来临前三阶矩到五阶矩会陡然增长一千倍，因此高阶矩可以用来预报危机。根据这一方法还可对期权定价理论进行修改，得到更为符合现实数据的期权定价公式。

## 简报与讨论稿（2012.7至今）

### 卢锋教授：



1、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动因素分析（1990-2030）。与国际经验和普遍规律相一致，我国农业劳力占比从改革初期超过七成下降到2010年约35%。随经济持续增长，估计该占比值未来20年仍会以年均略高于一个百分点速度下降。

虽然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期已过，然而这个历史进程仍将长期持续。年老退出影响呈上升趋势，甚至可能成为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的单个最重要因素。从就业转型进程看，我国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压力将趋于缓和，然而仍将长期存在。

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形势演变特点，就业政策应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应在提升经济增长结构与质量同时加快培育城乡劳动市场体系以促进就业增长，通过推进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要把就业政策调整与人口、户籍、土地制度改革配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以保障就业和经济最终实现成功转型

### 2、破解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适之谜

卢锋教授揭开了奥肯定律对中国不适的谜题，并提出了广义奥肯定律和中国奥肯关系。第一，指出用奥肯定律的简单模型来看中国的数据会出现很多问题，通过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的解释都差强人意。第二，对奥肯标准模型进行扩展，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劳动力转移，放入模型中。第三，统计结果发现，用新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卢锋教授认为，奥肯定律“适应性谜题”的症结在于，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农业劳动力趋势性转移是劳动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刻画宏观周期与劳动市场关系的正确模型，应适当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基本变量。卢锋教授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引入劳动力转移变量建构一个两部门广义奥肯模型。模型推导得出，劳动力转移率与失业率变动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率。

### 曾毅教授：



1、建议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基于六普等最新数据的深入研究，尽快实行这一大大有利于我国克服许多远虑和近忧的与时俱进政策，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诸多严重弊端，将显著缓解人口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既满足群众生二孩意愿，有利于母婴健康，又避免生育堆积，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是老百姓和国家的“双赢”，是促进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抉择。二孩晚育试点地区840多万人口20多年成功经验早已证明其可行性。

2、中国老年人中家族长寿对健康的影响。曾毅教授认为，遗传因素是影响健康和长寿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家庭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和长寿的主要原因。曾毅教授考察了中国老年人的家族性长寿与健康的关系，同时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此外，利用长寿老人子女与对照组的比较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方法来了解中国老年人的家族性长寿和健康的关系。

## 简报与讨论稿（2012.7至今）

### 余淼杰副教授：



1、企业出口强度与中间品贸易成本：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致这一结论的原因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证明多年以来国家实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强度，说明加工贸易的确是扩大出口比重的重要途径。其次提示中间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在如今全球需求疲软出口不景气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以及其他投入成本促进企业出口。

2、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目前，由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产业升级的这两股动力在不断地被削弱和被弱化。国内因为劳工成本上涨、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导致我国劳力密集型产品国家竞争力削弱；国际上则因为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疲软。所以，研究得出，要保证我国在下来的第二个十年产业继续升级，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我们得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国，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准入，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

### 巫和懋教授：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仅为26%。与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相比，其比重还相对较低。并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产性投资，这些投资在未来具有产生现金流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没有达到发生危机的程度。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确实给中国经济施加了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筹集和使用缺乏相关的监管机制。在地方政府层面，预算控制并没有实施；在某些省份，债务规模和偿付责任数据并未公开。第二，无效率的公司治理。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常常由地方政府任命，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第三，过度依赖土地转让费用。银行贷款占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比重通常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障，但是，该保障依赖于土地转让费用不断提升的预期。当土地价格下跌，偿付银行贷款就变得极为困难，地方政府可能会去寻找其它财政资金。

中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巫和懋教授建议，中国各级政府需要加强财政纪律，需要重新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应当具有发行债务的可行性，并具有对政府预算的控制和监督机制。此外，中国地区间的财政转移也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一个措施。



## 简报与讨论稿（2012.7至今）

### 赵耀辉教授：



中国城乡退休模式。赵耀辉教授主要通过最新搜集到的CHARLS数据研究中国当下退休模式，以及退休的影响因素，并且进一步分析城乡之间退休模式差异的原因。中国城乡退休模式存在极大的不同，这归因于社会保障体系、经济资源以及子女养老模式在城乡的差异。对于政策而言，未来城乡居民的退休政策需要不同的加以对待。对于城市那些尚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希望内退的劳动者，应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劳动岗位上；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应当继续给予其自由退休的权利，但是应为其在法定年龄退休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保障。

### 雷晓燕副教授：



代际转移问题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代际转移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有：首先，代际转移现象非常普遍，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只是转移的方向不同。其次，研究代际转移问题对于理解资源的配置

非常重要，代际转移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在政府制定公共转移政策时不应被忽视。此外，由于代际转移具有维度广、衡量难等特征，研究者很难识别代际转移的动机，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供研究。

雷晓燕副教授提出了几个可行的研究方向。一是检验动机，正如前面提到的，现有的检验中国代际转移动机的文章非常少，并且这些文章中所用到的数据都有缺陷，而CHARLS数据质量非常好，可以支持更进一步的研究。二是分析代际转移在子女之间或父母与配偶的父母之间的差异。三是研究代际转移与公共

转移的关系，检验公共转移的效果。四是可以看代际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比如看独生子女一代是否会因为养老压力大而增加劳动供给。五是看最优养老政策，研究是由儿子养老还是由女儿养老或是入住福利院的老人幸福程度最高。

### 张帆教授：



政府主导的产业部门市场化进程研究。建立了一个基于共识的改革理论框架，描述了部门改革的顺序，即产值规模较小的产业优先改革，改革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进一步推动其他产业的改革。研究中特别强调了金融部

门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一些规模较大的产业可能通过联合金融部门扩大要素投入，以对抗已改革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其改革的推动。要保证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可行政策是有效控制流入未改革部门的要素量，同时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以弱化其投资到未改革部门的动机。

### 姚洋教授：



不同经济增长率和全球失衡。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和经常项目余额呈U型关系。GDP增长率和投资率、储蓄率显著正相关，GDP增长率对储蓄率影响边际递增，但对投资率边际影响为零。

姚洋教授用简单的两国模型从生产率冲击角度，解释了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和GDP增长率之间的U型关系。

## 简报与讨论稿（2012.7至今）

### 徐建国副教授：



1、公共债务，资本回报与宏观经济基础。通过分析发现：（一）地方政府的负债，主要投向周期长、外部性大的基础设施，而我国基础设施依然落后，这些投资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二）中央地方收支倒挂的财政体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不足，而地方政府“短债长投”，导致短期偿债压力过大，是地方债压力的财政和金融根源；（三）公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总体健康，资产负债率较低，债务风险可控；（四）工业资本回报率处于上升趋势，近年来保持在高位，潜在投资需求旺盛，内生性紧缩的风险不大。在通胀压力趋缓，宏观调控趋松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有望回升。

2、高房价与低生育意愿。哪些经济、环境变量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生活成本是关键变量。生活成本包括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1998年住房改革后，房价快速增长提高了育龄人口的生活成本，高房价和住房面积约束进而减少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国省级数据显示，城市生育率和城市住房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商品房价格和总和生育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控制收入因素后，房价收入比和总和生育率负相关仍非常明显。

3、资产定价因子的可移植性。徐建国副教授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适用于A股市场的市场平均回报率、市值、市盈率和超额成交量的四因子模型，这一因子模型不同于美国市场的因子模型。然后探索市值、市盈率因子背后的风险与特征因素，发现股票市值背后既

有风险也有特征因素，而市盈率对回报率的影响由股票特征导致，与风险无关。

### 汪浩教授：



所有权结构与市场效率。将企业家通过主观努力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行为定义为“创新”，企业家的努力程度无法被外界观察。根据创新的外部影响，创新行为可分为“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前者利人利己，后者损人利己。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私人所有制为两种创新均提供较强的激励，公有制则相反，但是较强的激励未必能增进社会福利，取决于哪种创新占主导地位。本文以医疗服务市场为例，将两种不同创新放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讨论，指出自由市场的效率与行业特点有关系，一般来说存在一个最优的混合所有权结构。

## 姚洋：中国新领导层第一道关

此次中国领导层换届正值世界经济处于不稳定时期。欧洲仍在试图寻找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解决方案来化解欧元区危机，美国濒临财政悬崖。发达国家的调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也许需要持续到本十年结束。对中国而言，这种外部形势意味着出口的高速增长将永远成为过去。

中国国内的挑战也同样严峻。中共“十八大”承诺，要让居民人均收入在2020年底前翻一番。以过去的增长速度衡量，这个目标并不过分。然而，有几大因素可能让这个目标在本十年内实现变得富有挑战性。面对出口增长减速，中国必须扩大国内市场。然而，十多年来，家庭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未来这个比重会扩大。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见顶，在那之后，中国将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在2015年至2020年之间的某个年份见顶。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新一代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十八大”强调了几项改革措施，以求应对这些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是改革户口制度。户口制度建立于1958年，目的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这项制度事实上是将一个人的合法居住地限定为其出生地。然而，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

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

实际上，中国在2012年2月就宣布了新的户籍政策。其中提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包括租房），可以申请落户。中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和居住三年以上，同样可以落户。

如果这项政策得到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原因有两点。首先，工人把大部分收入储蓄了起来，因为他们必须为将来回老家做准备，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根据粗略估算，如果中国农民工消费水平提高至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增加4.2个百分点。

其次，一旦入了城市户口，工人会把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接到城市，而城市人口增加将为服务业打开更大的市场。中国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因此很有希望填补2015年-2020年期间制造业占比下降造成的缺口。

中国领导人并非选举产生，但仍然存在政治周期。在1978年至2002年期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但也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土崩瓦解，同时也忽略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政府出台

了重大举措，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这届政府可以说有些左倾。因而有理由预期，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重返改革轨道。“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及工资改革。现任总理温家宝推行了工资改革，以期扭转中国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想延续现任政府的左倾政策。

如果新一届领导层希望推行“十八大”期间阐述的改革措施，他们将面临艰巨的挑战。在宣布户籍改革8个月之后，中国仍未出台具体实施计划。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本地居民都反对此次改革。地方政府认为，接纳外来人口将极大地增加地方公共财政负担，而城市居民认为，外地人会危及自己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并挤压他们本已紧张的生活空间。与以前那些为社会带来明显益处、只增加个别人群负担的改革不同，户籍改革不会立即带来益处，却会明显、而且立刻威胁到大多数人口的利益。

新一届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才能为“十八大”期间承诺的改革争取到适度的支持。姿势已经摆好了，现在我们等待真正的行动。



## 卢锋：透视日本“低增长稳态”

战后日本在战败国废墟上重启经济追赶并获意外成功。然而在人均收入等基本发展指标完成收敛后，受人口老化与文化封闭等超长期结构因素制约，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渐趋消停的“低增长稳态”。流行观点言必称日本“失去的十年”或“失去



的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然而这个潜在认识前提有待商榷。如果说日本经济过去20年表现令人失望，这一状态本质上应是日本长期经济社会结构性条件使然，其政策得失仅发生相对次要影响。日本经济未来有望继续维持“低增长稳态”，构成目前全球经济减速的特殊局部。

“失去的N年”之类流行表述，大体指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等指标相对早先高速增长时期增速降低甚至失速现象。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并经常发生负增长，1991-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1%。日本名义GDP从1991年458.3万亿日元缓慢增长到2000年511.5万亿日元，此后便在波动中呈现缓慢下降趋势，2011年只有468.4万亿日元，在间歇性通货紧缩背景下二十年名义GDP近乎零增长。

不过要知道，日本经济增长失速发生在人均收入等基本经济指标完成对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国成功收敛之后。用汇率折算，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GDP从1960

年469美元增长到1995年3.69万美元。日本相对美国人均GDP比率1960年为16.6%，1987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并在日元汇率超调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达到美国一倍半。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失速，美国

则先有互联网革命快速增长，后有世纪初房地产-金融业泡沫化增长，加上日本汇率升值趋势不复存在，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收入相对美国下降，最低到2007年只有73.8%。近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和日元汇率变化，日本相对人均收入有所上升，2011年回升到94.5%。

日本人均收入等指标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标志日本经济总体置身或逼近全球产业与技术前沿位置，于是早先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实现高增长的驱动力渐趋式微。日本问题症结在于，进入全球技术产业前沿后，由于自身内在难以改变的深层结构特点，缺乏在高收入阶段持续较快增长潜力，派生长期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近乎停滞格局。从日本经济与社会基本面条件不利于前沿创新要求角度看，与其把日本经济过去二十年增长低迷看作是光阴“丢失”，还不如说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合规律现象。

处于后发追赶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与已完成转型或追赶的发达经济体比较，其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以及增长实现机制，都存在实质性差异。后进国家能够借鉴发达

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较快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可靠驱动力。已达到人均高收入发达国家谋求较快增长，则需更大程度依靠产业技术前沿发明创新提供支持。由于前沿技术进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制约，最终能够对产业结构提升发挥实际作用的技术进步速率较低并且成本较高，因而前沿国潜在供给长期增速较低。

发达国家要保持较快增长，更需要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提供原生性（original）研发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广纳优秀人才的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条件，更需要允许和鼓励个人潜能发挥与个性张扬“冒尖”的价值观与文化氛围，更需要能有效激励企业家创造能力的制度环境，更需要把思想、创意和发现转化为大规模产业的高效资本市场与金融系统，也更需要在经济系统“创造性毁灭”嬗变中具有较强调整能力的企业制度。

是比较而言，日本与这些要求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日本文化具有重团队、轻个人，重内聚、轻开放，流程管理强、理论思维弱，模仿创新强、前沿创造弱等方面特点。这些“文化基因”层面特点便于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并利用当年冷战环境快速追赶，成就战后大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然而同样文化禀赋条件不利于日本在技术产业前沿开拓与创造，因而在跻身主要发达经济体后呈现“低增长稳态”现象并不奇怪。

观察两个可量化指标有助于加深对日本“低收入稳态”形成机理认识。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从根本上制约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二是日本资本形成早已呈现负增长趋势，导致日本资本存量进入停滞甚至下降通道，构成解释日本长期经济增长失速的关键宏观原因。

数据显示，上世纪50-60年代战后经济追赶初期，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5%-6%。人均收入较低与人口结构年轻，构成经济后进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和后起直追的有利条件。然而日本经济追赶同时人口结构也快速老化，到1992年人口老龄化比例已超过13%，比战后经济起飞初始阶段比例值超过一倍，2011年老龄化比重已高达23.3%。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抑制作用。

经济发展理论高度重视固定资本形成对长期经济增长支撑作用。虽然在观察当代经济增长，可见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推动作用更为彰显，但是固定投资长期走势对经济增长仍具有不可替代解释作用。例如，当代信息革命是重大技术进步，劳动者具有全新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手段代表了人力资本提升，这些对当代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然而“知识性经济”增长效应实际发挥，不能脱离IT硬件条件以及全社会范围在电脑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大规模投资。由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通常不会以纯粹形态独

立存在，而是不同程度与固定资本以相互协同与补充方式发挥功能，因而固定投资与资本存量等可量化指标仍是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解释变量。

日本上世纪90年代后投资增长乏力并经常出现负增长，构成“低增长常态”的重要背景条件。数据显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资本形成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后多数年份资本形成出现负增长的萎缩态势。用1990年不变价衡量，日本资本形成1996年达到15.3兆亿日元峰值，此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1年只有11.6兆亿日元，比15年前峰值下降24.8%。

过去20年前后投资增长率与绝对规模双双下降，导致上世纪末以来日本资本存量长期增势明显趋缓，近年甚至出现绝对规模下降动向。我们初步估测的日本实际资本存量数据显示，2001-2008年间日本实际资本存量增长不到5%，2010年实际资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一国资本存量是社会生产函数的基本结构变量，在资本存量成长停滞甚至趋于萎缩背景下，要想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不啻缘木求鱼。

人口结构与资本存量从潜在供给角度提示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根源，另外投资疲软不振还直接从总需求角度解释“低增长稳态”。观察支出法GDP构成可以看到，资本形成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增长进入最后

一波高潮时达到年均约2.5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后投资趋势性下降，导致资本形成对GDP贡献长期为负值：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资本形成对GDP增长年均贡献值分别为-0.18%和-0.12%，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贡献值分别为-0.28%和-0.47%。

进入“低增长稳态”后，日本经济增长需求面驱动因素主要依赖消费与净出口。数据显示，1990-2010两个十年间，除2000-2005五年外，其他时期消费与净出口助推总需求增长效果都不同程度大于同期GDP实际增长幅度，说明同期日本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国内消费与国外需求。以2005-2010年为例，消费与净出口加总增长效果相当于GDP增长率1%，比同期GDP实际0.38%增长率高出一倍多。

日本进入“低增长稳态”后，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收入项增长构成国民总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数据显示，日本经常账户收入项金额从1996年58060亿日元增长到2007年高峰时的163720亿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亿日元。经常账户收入项盈余相对日本GDP比例从1996年1.13%增长到2008年3.23%，这块外部收入增长相当于同期GDP增长的大约两成。



## 周其仁：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

2012年11月28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发言时表示，政府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时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力量，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因为地方围绕这个难题，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应该吸取这个经验。

### 人口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制存在冲突

周其仁首先分析了当下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过去我们体制是一个划地为牢的体制，城乡之间不同的产业、不同地方，包括城市之间都是不能轻易动的。这种不能动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改革以后增加了经济自由，但人移动容易，而土地移动非常难，土地的权利界定比人资产的权利界定困难。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东西不匹配，人口的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制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

### 粮食体制改革经验可供参考

周其仁认为可以借鉴粮食体制改革时的经验，他说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统购统销的粮食体制改革非常艰难，统购统销保护了军队、农业，如果把它一天就拆掉，口号可以喊得很激进，但国民经济就乱套了。当时就找到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渐进的改革方法。第一，有些地方不适合种粮食，用经济收入的钱交后备税，政府拿这个钱收购种粮食的地方的粮食。从交粮食变成可以交钱，这是当时改革政策的一个方法，使刚性的制度增加一点弹性。第二，在国家规定的保大城市供应，保军队粮食数额之外，增加生产的粮食可以拿到市场卖，即双轨制。所以后来统购统销的改革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变成全国政策走出来的。先稳住，慢慢发育，等到时机成熟再变，完成市场化。这个经验很可能在土地改革中可以参考的，当然土地问题比粮食问题复杂。

### 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

周其仁谈到了重庆、成都改革经验，他总结说两地经验是把原来非要通过政府卖地，变成可以不用通过征地就纳入到市场交易的范围内。城市和工业用地除了从国家征地卖地这个途径，还可能有另外一条获得土地资源的途径，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目前市场轨道还是一个初期的阶段，发育不成熟，有的

还依附在原来的行政主导的情况下，但是里面也有些新的苗头，直接把这些资源组成一个公开拍卖的市场，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去发行价格，去定价，评价它的相对稀缺性。这样慢慢可以让土地资源的配制和人口流动之间配合好一些。

周其仁最后谈到，地方实践的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北京制定政策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力量，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因为地方围绕这个难题，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应该吸取这个经验。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大，而且复杂，完全靠我们想像哪样最好，这也

有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实践中的经验。

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有两条最重要的经验：第一是确权，第二是市场。

第一，确权。周其仁说，在动土地制度改革之前，有个基础工程要做好，就是确权，确权不单单是经济改革，它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它划定政府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且确权不能光确到集体，要确定到户，农民拥有自主权，拿了权也可以不转让，他觉得自己用合算就自己用，要他自己做决定。

第二，交易平台不能地方卖，要放在一个较大的平台上来放大价格。现在土地是高度地方化，这对资源配置，从经济原理来看是不太好的。现在各地的土地差价差得非常多，而农产品的差价没那么多，因为白菜、粮食等有一个全国价格的形成机制。

周其仁认为，这两点在地方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验当中，开了一条新的轨。目前，成都、重庆都有产权交易中心，重庆一年可以有5万亩的地票完成，比如农民可以把老家的土地复垦为农地，把盖房权利放到重庆交易平台定价，有人买，再落地，这就改变了划地为牢的资源配置。

2008年成都市委发的一号文件也受到他高度评价，该文件在成都整个范围内进行了确权，虽然底下干部有很大意见。拿地大容易，会导致土地的低效率配制，拿地困难，拿过来要比原来用得更合理。从成都看这条路艰难是艰难，但是可以走得出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CCER校友通讯 总第1期  
CCER研究生会校友部 制作